

憶齊老師思貽

(續)

記一位專默精誠的佛學者並及我的留學生涯

唐龍

語言學及古文選讀都在圖書館上課。圖書館是座十層樓的建築，上面六層的外觀只是個巨大密閉的長方形盒子，由玲瓏剔透的下面四層撐舉著。我們上課好像在六樓，整層樓的中央是書庫，四周是教室及研究室。課堂上需要什麼參考書可以馬上到書庫找；其間琳瑯滿目，都是東亞典籍，包括大正藏及諸多佛學著作。在書庫查書時偶或見到齊老師進出他專用的研究室，刻劃出一位學人孜孜矻矻做著學問的寂寞。

有一次我在齊老師辦公室，電話鈴響起而適逢他外出，我只好代為接聽，是旅行社打來的，要我轉告他去紐約的機票業已訂妥；由此知道他有時去紐約，會見世界宗教研究院長沈先生家楨大約總包括在日程裏。齊老師和我論學時，頗稱許我反應比美國學生快，能觸類旁通；我說也許是我勇於表現，而他們謙虛的關係；他說總得有東西才能表現呀。他也告訴我，比舍普教授說收我這中國學生對課堂很有貢獻。出國以前，國內報章雜誌在我腦

海中造成一種印象，以為美國學生愛問愛說，不論得體與否；然而我在印大和哥大都覺得美國學生在課堂上深藏不露，只是規規矩矩寫筆記，教授大抵也不太鼓勵發言，反弄得我這中國學生要把話憋在肚子裏，也許這只是文科研究院特有情形，而我的見聞也有限；但至少這是美國學府的另一面。

隨著時光的消逝，我漸為下學期的學費及生活費發愁，問齊老師獎學金的可能性，他說系裏有很少的錢，但只限給本國學生；我也向比教授探過口風，問他哥大怎麼樣，他說：「哥大太貴啦，在印大你勒緊肚皮總還過得去。」但這顯然不是辦法，因為我那時剩下的錢交了下學期的學費，生活費便沒著落；留下生活費，便顧不了學費。佈告欄上有工作機會，但外國學生不得申請。我不免想到康德愛護他的學生却不肯免除他們的學費，以訓練他們的獨立性的事。然而在經濟來源枯竭的時候，怎能談獨立性呢？我不得不重行考慮哥大；哥大在紐約，機會或許多些。

半個學期過去了，齊老師問我讀了些什麼書：「我給你開了張書目，你也得給我開張書目來。」我遲遲未能應命，因為我學期論文的題目還游移不定。後來齊老師和我談到中觀的本體和現象說，我靈機一動，本體與現象的分際，我向所留意，何不就此作題目呢？這實際上就是討論中觀的二諦說。我在論文中引述「測不準原理」[◎]以說明現象世界之不可把握；齊老師叫我多讀休謨的著作，我發覺他的「無我說」直與佛家無別^③；我對默提批評中觀「未明確描述本體為實質」之說不以為然，因為不以本體為實質，而以本體為空，正是中觀的特色，所以中論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反以此為中觀病，則是完全未得中觀的精髓。這點很得齊老師的首肯，他指出默提實際上是印度教徒，以梵我為實體的觀念根深柢固，不免抱那種成見來衡量中觀。

我終於能如期交出「獨立研究」這門課的學期論文^④；然而課程的結束也是我必須面對現實的開始。首先，除非我另行交錢，就得遷離宿舍；同時我接到校方通知，不久前我提出的任大學部宿舍管理員的申請未蒙批准。

我在宿舍認識的一位基督徒同學帶我往訪學校附近的一所路德教會，承牧師慨允讓我這「異教徒」住教堂的地下室，總算有個地方可以棲身寄存行李。有一天我們閒步到一家中國餐館用餐，跟老闆談天，得知他是讀物理什麼改行的，夫妻檔；問他有什麼事可作，他叫我試試打雜。作了不過兩天，倒聽他說了好幾次「你看，沒啥可作的」；生意實在清淡得可以，我只得識相點，自動走路。我也曾冒暑沿着公路走去應徵所謂「旅舍經理」，結果不過徒勞往返。齊老師打電話到教堂，殷切致問，並說有人到紐約工作一個暑假，便可以生活一學期而有餘；但我對自己有沒有那種本領不敢自信。我在教堂住了十來天，收到台灣轉來哥大重

發的入學許可函：「文理研究院很高興邀請你到東亞語言文化系作博士研究。因為名額有限，務請在兩週內給我們接受抑謝絕的回應。」

我在幾乎走頭無路的情況下，只好一面回信接受這項「邀請」，一面請已退休的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教授戴博士秉衡（我會將他的一篇論文「禪與心理分析」中譯，謬蒙稱賞）為我寫推薦信給沈先生家楨，希望他能資助我到哥大攻讀佛學^⑤，沈先生知道我在台灣和慧炬的淵源，讀過我在慧炬的文章，欣允與我會面，於是我匆匆去了紐約。從此竟不得多承齊老師的教誨——殊非吾願，吾不得已也。我寫信給齊老師說明我不能重回印地安那的苦衷，並告以他所要的印順法師的著作行將由台灣寄達他手中。我回信賀我能在紐約就近得沈先生之助入哥大，又問我書款多少，另附一介紹函令我持見一位任職世界宗教研究院的梵文學者。我不要他付書款，他說「如此客氣，却之不恭」，寄來兩本精美的英文原版著作為謝，其中一本就是默提的「佛家中心哲學」（他對此書雖有微詞，基本上相當推崇；我寫論文時用的是台灣的廉價翻版書），書的扉頁題有上下款；可惜我求學期間住處動盪不定，兩本書是什麼情況下失蹤的都弄不清楚。我是書痴書迷，又兼書乃吾師所遺贈，丟了真堪痛心。

那年暑假的剩餘部分就在沈先生佔地五十英畝（後又擴大為百畝）的長島菩提精舍和相距十分鐘車程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設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度過^⑥。在圖書館裏看到齊老師的英文著作「佛家形式邏輯」，我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見著那些邏輯符號嘆為天書；只依稀記得他在序言裏說：「我的英文未曾先請英美人士過目，或者未免可哂；而我的見解也未臻成熟……」謙謙君子之風，溢於言表。

開學後，我搬到哥大所在的曼哈坦區北邊，週末到菩提精舍

工作。我在哥大創立佛學研究社^⑦，請我的指導教授羽毛田義人為社務顧問，在沈先生支持下，租了學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作為活動場所，為期一年有餘。我曾向齊老師要了一張選他佛學課的學生名單，似乎長達二十來人，但因地理的阻隔，這張名單不會發生作用。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哥大時對系裏的每一課程於獲取學位方面所佔的分量缺乏了解，以致必須放棄某些課程，重選另一些課程；走許多冤枉路，浪費許多謀生籌學費之餘本已捉襟見肘的時間。我初到哥大，想選一位客座副教授的課，他問我那裏來，我說印大來，他馬上說：「你該回印大去。」他在哥大同系畢業，這本是過來人的話；言下之意，這個系進去了就難以出來。可是我偏想在哥大一試，同時重回印大的經濟問題也實在令我裹足不前。

我在哥大的第二年，恰值羽毛田教授的休假年，他回了日本；而我只忙於應付這門課、那門課，這語文、那語文，寫學位論文的日子，不知端倪。聽同學說，在東亞系耗個十年八載稀鬆平常。從我自己的進度判斷，這話不假；午間或傍晚回到分組而來的斗室裏，往往閉門獨坐，有時繞室徬徨，瞻望前程，不知將何去何從。窮則思歸，於是我要回印大，寫信給齊老師；他回信說對此「聞之甚欣。若能就中觀方面作論文，甚有前途也。」然而我坐在紐約中央車站，看着熙來攘往的人羣，想起紐約的種種，又想起千辛萬苦才得到哥大，說自己就要捨此而去了，却未免油然而生傷離之感，不忍遠行。

光陰荏苒，我的經濟狀況日益窘拮；得不到曼哈坦南端的一座公寓大樓協助維修，以換取住處。後來大樓因為欠稅被市府接收；積雪盈尺的日子裏，也沒有暖氣熱水。所有的住客都接受政府補助搬走了；但補助不到我，我也沒處搬，獨自住了下去。從學校回來，三番兩次發現宵小穿堂入室，偏地狼藉；甚至登門

行劫毆人的事件都發生了。耶誕新年，家家戶戶燈火輝煌，而我所求只是電力公司不要剪斷電源，滅了我賴以讀書的一盞孤燈；水管結冰，用水來自樓前的消防栓；寒風貫窗而入，凍指裂膚^⑧。幸得仁俊法師看出我的困境，不僅自行幫助我，還請洗塵法師慨作財施，勉為撐持——我不斷告訴自己，我在哥大修學位乃創造一項奇蹟^⑨；當然這只是不讓自己半途而廢的誇大之詞。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眼看著課業都打發將畢，而學位論文却始终不能和指導教授取得一致的見解，「創造奇蹟」的銳志不免受挫；想起初到印大就可以跟齊老師寫中觀，何其感慨。是在一天晚上打電話給齊老師，也問候，也訴苦；他一接電話才說了「等一下」，便放下聽筒，原來是要去把正播放着的什麼的音量降低。莊子說：「逃六谷者，聞人足音，蛩然而喜矣。」可想而知，在萬籟俱寂的為學的歷程中，如果沒有些聲響（梵唱也罷，音樂也罷）來敲碎那孤寂，將是何等難耐——在我們還不能效聖人之棄耳而不聽的時候。在電話中我再度提起想回印大跟他寫論文的話，他要我把幾年來所寫的學期論文讓他看看。

我的假期通常沒有處去，唯有讀書。但那年的感恩節假期（始於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我的情緒低落到極點；心想與其獨坐愁城，一籌莫展，不如作次遠行，親自見齊老師，安排回印大的事。星期二下午，我把那座空樓交給鐵將軍把守，默禱佛力加被，使其無事；帶了幾篇齊老師要看的論文和幾件衣物，便去趕搭越州巴士。第二天車抵位於印州中心的首府印地安那波里斯，在那裏等候一兩小時，才得轉車到印大所在的布魯明頓城；首府和布城間的車程約一小時，沿途看到乳牛成羣，原野廣袤，眼界為之一新，喚回了久已塵封的對印州的記憶。在布城下車，又蒙同車抵布城的人讓我搭個順風車，總算到了印大，時間約摸是下午三點。走到古德巴底樓才發覺各辦公室都只有一兩位「留守內閣」的人員，猛然悟及感恩節假期那裏是辦事的時候。打電話

到齊老師和比教授家沒有人接聽，想是和我取了不同的方向，遠行外埠了。漫步到學生活動中心，勾起和齊老師同坐吃午餐的情景，連帶又想起坐在他的車子過郵局寄信，到銀行提款……太多太多「當時已惘然」的追憶。聽說這裏也供住宿，便去問問價錢。「廿五元一晚，沒有折扣，也沒有更便宜的。」櫃枱的人說。我聽了連忙打退堂鼓。走着走着，經過學生浸信會的辦公室，抱着姑妄一試的心理，走進去問有沒有學生宿舍可以借宿，輪值的學生找來牧師；我向牧師自我介紹曾是印大理查齊教授的弟子，牧師答應爲我設法，叫我稍等，便走到另一室去，我瞥見他在打電話。過了一會兒，他出來說：「宿舍在假期都關閉了，沒有辦法。」頓了一下，又說：「不過假如你不介意睡客廳的話，你可以住在我家。」哦，真的嗎？這真令我意外地感動，我上了他的車。在車上，我猜想他對不能爲我安排宿舍一事，早就心裏有數；但作爲神的使者，他不肯拒絕我，只是要先打電話到東亞系查查齊老師門下是不是有我這名學生。第二天和他們夫婦子女一家四口經歷我到美國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美國家庭共度的感恩節，也算不虞之喜。星期六晚間，我試打電話到齊老師家，他已回來了。他說適逢他假期出外旅行，要不然我倒可以住他家；問明了牧師家的地址，約定次日午間來。師生久別之後可以見面，分外高興。第二天我們在一家餐館吃中式自助餐；齊老師約略看一下我的論文，叫我星期一到系裏見他，然後往訪系主任。

兜頭一盆水沿脊背而下；那麼我只好把這次回印大當作舊念之行了，能見到齊老師是很快慰的一件事；也遇着前主任鄧教授，可惜沒有看到比教授和柳教授。牧師夫婦對我終究要放棄重回印大之想的怏怏之情正不下於齊老師和我自己；那晚恰好他們要去首府赴一個餐會，特別繞道巴士站送我回紐約。我迄今保有他們所送的一本時代週刊，上面貼的姓名地址簽條猶在：「Mr. R. P. Liemann……」，不知再有機會回布城，猶能重逢故人否？

阿彌陀佛，在我離開紐約的一週之中，空樓沒有發生事故，真是暗捏一把冷汗。辭別齊老師之前，他曾說不久將有紐約之行，要我爲他代訂旅舍。但凡我的住處像樣些，我必定會邀請齊老師住我的地方；然而幾年以來，這座樓每下愈況^⑩，實在已經見不得人，所以我只能如囑爲他跑了幾個地方，最後在時報廣場附近一家尚稱潔淨的旅館訂了一間套房，每天廿五元（正是印大學生活動中心宿舍的價錢）。他來紐約以前（八二年一月），打電話問我旅館的地址，我也問了他到達的確切時日。那天我帶本書悠然坐在旅館登記室前的長廊等他；看見他提着兩隻箱子出現在門口，正待放下箱子推門進來，我急急迎上前去拉開大門。「哎呀，你何必在這裏等着呢？」他帶着那特有的謙抑的笑容說。我們一起去看房間，他覺得相當滿意，忙着打開箱子，理出衣物。在齊老師逗留紐約的幾天裏，我陪着他逛街、辦事，擠地下火車、等公共汽車。他聽說中國城某家素餃好，又聽說「四五六」的菜好

那時擔任系主任的是羅教授郁正（系名也改爲東亞語言文化系）。齊老師叮嚀囑咐，要我誠懇地和羅教授談一下。羅教授非常親切，指令我和研究生指導商討轉學的細節。研究生指導已不得復是我初到印大的柳教授，換了人；他要我填申請表，呈推薦函，然後等待系裏的考慮。我說研究院當局告訴我，一日爲印大學生，就永久是印大學生；他說當我向研究院索取申請表格時，不小心鑒賞佛教藝術。齊老師帶來一些佛像與花鳥的刺綉，說是朋友妨跟他們說系裏的研究生指導有自訂的單行法規，這話於我有如所託，要讓騷瑟比Sotheby公司估價。騷瑟比是世界最大的古董

、藝品等的拍賣公司^⑩，但我孤陋寡聞，從齊老師那裏才首次聽到該公司的名字（後來我也曾拿幅羅漢圖請他們估價）。我們從該公司門市部——位於學世聞名的第五大道乘他們特備的免費專車到該公司辦事處；公司人員收下刺綉，然後看看我們的神情，問齊老師是我父親否，齊老師連說：「朋友、朋友。」我忙道：「是師生。」我想我年幼失怙，視齊老師為父親，有何不可？然而我始終沒有表達過這種意思，而齊老師忽已作古。莊子說：「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註莊子的人說：「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何況齊老師與我數年以來幾乎是天各一方，終於相失，怨悔何及？

齊老師要回印大那天好像又是個農曆除夕，我着意穿得整齊，送他到機場；離他所搭晚班飛機上機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齊老師要我先回去，但我堅持要等他上飛機。這事實上是一種異鄉遊子「心怯空房不忍歸」的心理；我不顧面對那座空樓，我要多延長一分和齊老師一同「過年」的感受。於是我們坐到二樓餐廳的平台上，平台昇於底樓的磨石子地之上，圍有欄桿，可以伏觀底下的人行色匆匆，而我們在台上却自得一份悠閒與寧靜。齊老師說他初出校門時，印大和耶魯都聘他，但因為知道耶魯當時的系主任不好相處，所以選了印大，和外界接觸未免稍感不便；但對我來說，他的選擇却造就了他和印大與我的一種「緣」；我在印大雖僅一學期，頓得良師益友之樂，令人懷想無已。齊老師興味盎然地提到「美國名人錄」，以為他們做事很週到，成功並不偶然。原來他以書法著作而列名其中，該刊特別遣人登門造訪並致贈獎狀及紀念品。「他們消息怎麼這樣靈通呢？」他說。「這是聲名不脛而走呀！」我說。他告訴我新人謀職之難，印大一名助理教授出缺，竟收到數百件申請函。我們談到研究生指導為系裏所訂的「單行法規」，他很不以為然；我問他有沒有對此表示過意見，他說他從不過問這類事。我一面和齊老師娓娓交談，一面緩緩嚼着

盤裏的乳酪，有如得嘗醍醐至味。齊老師最後說：「研究生指導去日本進修了，你要不要再試試回印大的事？」我不會作肯定的答覆。事後想來，齊老師是個含蓄內斂的人，他那句話的意義必不僅止於隨意的一問；可是我竟因循遷延而終究無所行動。

我偕同齊老師走到旅客登機前受檢的關口，我不能再前進了；目送他孤單地一步步在長長的走廊裏漸行漸遠。他來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他的正面，滿是笑容；他走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惟留悵惘。幾個年頭過去了，那景象還是一樣不可磨滅。「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的滋味可謂一時徧嘗。

一九八二年春，我在哥大通過博士前的口試，暫時離開學校，糊口於四方。不久羽毛田教授因癌症逝世，我的博士論文更幾乎陷入停擺的狀態。在齊老師去後，我對此事尤覺介於懷，當憑自力求其完成，以報答所有於我有啓導和資助之恩的諸長者。

大約是一九八四年年中，我從洛杉磯回紐約。夏老師志清請我在哥大附近的月宮飯店午餐，談起羽毛田教授之死，不勝唏噓感嘆。羽毛田教授自稱是今之維摩詰居士，有其心而無其財；他念念不忘華嚴經譯成英文，奈何天不假年。齊老師和他一樣都只有教授的待遇；可想而知若稍有薄產，也是由省吃儉用而來，獨能為佛教圖書館捐出一萬五千元，這是何等的眼光和器識。夏老師在最近的一篇長文中提及杜甫的「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⑪；我對齊老師生平所知極鮮，至謝世前後的種種更一無所知，只有「寂寞身後事」可以斷言。但是我決定像他這樣一位有佛學素養的學人身後不當這樣寂寞。我要出本雜誌紀念他^⑫，成立思貽佛學社紀念他；他不應遭人遺忘。在佛學社中擬先成立圖書室（見另文）；重視圖書，可以說是我和齊老師的「英雄所見略同」。

荀子說過兩句了不起的話：「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可以藉以論定我所認識的齊老師。註者說：「冥冥昏昏，皆專默精誠之謂也。」事實上，冥冥昏昏

和昭昭赫赫並列所產生的強烈對比，已使這兩句話不待解釋而自顯。齊老師既作了「冥冥昏昏」的功夫，我們願在佛學社會裏看到「昭昭赫赫」的結果。

註

①另一件事發生在語言學的課堂上。當討論各種羅馬字拼音體系時，我說羅馬拼音發不出準確的中國音，齊老師說怎麼不能，可以發得毫釐不爽。我說：「像CHI和CHIH怎麼分別。」他不答，似乎是行無言之教。若干年後，我才體悟到他的話不錯。

認為用羅馬字母發不出準確國音的人，是因為他們拿羅馬字（今用以拼西方文字）國語拼音按着英文字母發音，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們用國語注音符號發音要經一番訓練，用羅馬字拼音豈能不經訓練，抓着羅馬字就發英文的音？如果我們記住CHI發「齊」的音，CHIH發「郵」的音，那麼每見CHI, CHIH便覺其判然有別，和使用注音符號的結果完全相同。至於四聲，可以在羅馬字組成的每一音的右上角註以「1、2、3、4」。語言學和佛學並非不相干；舉個小例子，今天洋人每把大乘、小乘的「乘」字拼成cheng，其實這裏的乘是「車乘」的意思，應拼成sheng。中國人若跟着他們錯，便不可原諒。

②測不準原理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是說我人在任一時間裏不能同時精確測得粒子的位置及運動量。換言之，位置測得越精確，運動量的差誤就越大；反之亦然。無論如何，兩者的失誤都不會小於普蘭克常數。這原理於一九二七年由德國物理學家海森柏W. Hiesenberg發現後，引起許多科學家強烈的神秘主義傾向。

③休謨D. Hume（一七一——一七六英國哲學家）在「人性論」一書中說：「一旦我進入了我稱之為『自我』的什麼，我總在感官覺知上跌跌撞撞：非冷即熱、非光即影、非愛即恨、非苦即樂。我從未能離開感官覺知而把握自我；除了感官覺知以外，我什麼也

觀察不到。要是離開感官覺知（例如熟睡時），我便於自我瞭然不覺。……我們的眼睛在眼眶裏一動，感官覺知便已兩樣；我們思想的更替尤甚於視覺的變易。靈魂（自我）不能片時保持原狀；嚴格說來，（憑以認定自我的）單純和統一並不存在。

④論文題目為「中觀的本體與現象論」，曾譯為中文，以中英對照的方式發表於「慧炬」雜誌。

⑤哥大的佛學研究Buddhist Studies課程由東亞語言文化系、中東語言文化系及宗教系聯合提供。

⑥我寫有「在紐約和長島的一個仲夏」，在「慧炬」發表。

⑦我寫了「水到渠成」以紀此事，見「慧炬」。

⑧這事一言難盡，我當另寫一篇「住的問題」。

⑨我在台大的學長，出身醫科的范醫師進福獨是我的知音；不以為窮，乃以我為「窮不失志」。他給我經濟上的幫助，也支持我在空樓裏編出一本「佛學」創刊號（一九八〇年元月出版）。

⑩在這樓情況稍好的早些時候，我曾在其中學辦過兩次佛學座談餐會，為此寫了「兩會閒誌」發表於「慧炬」及「內明」雜誌。

⑪報載該公司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二日拍賣莫札特（一七五六一九一）九首交響曲（五百一十頁）的手稿，得款四百三十四萬五千元，創了樂譜拍賣的世界記錄。那位棄置亂葬崗的潦倒樂人怎能夢想兩百年後的今天。

⑫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美國發行的中報上連載夏老師志清的「東夏（志清）悼西劉（若愚）」說劉教授在他最後一本書中引述杜詩的這兩句話。我在哥大上過夏老師的「中國文學」及「中國現代文學」等課。我以佛家觀點看湯顯祖的戲劇「南柯記」，寫了一篇學期論文；夏老師的評語有云：「人生之所以可貴，正以其無常ephemeral耳。」

⑬我曾出過一本「名人」雜誌，創刊的構想是每期選一人為「封面人物」；現在便擬以齊老師作下期的封面人物，以為紀念。

成立「思貽佛學社」

齊老師(思貽)於一九八二年初從印地安那來訪紐約時，我在可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他知道壽治老師在中國城，便要我帶他往拜望。老法師特令人捧出水果招待；久別重逢，記憶不那麼鮮明了。可是經過一番交談，老法師似乎想起齊老師在北平當中學生時的情景，大家哈哈一笑：「啊，如今當了大學教授哪。了不起，了不起。」老法師得知我會受教於齊老師，又說：「我來作些佛學演講，你們師生替我翻成英文，把佛法傳給美國人，豈不是好。」齊老師欣然首肯，甚至談到一些具體的細節；可惜這事一直沒有進行。而今齊老師已不在人間，重理舊緒，為時雖晚，機緣未失。

我在哥大創設的佛教社，迄今猶在；哥大之有佛學社，這是第一個，也差不多是唯一的一個，和回教學生組織共用一個辦公室。我如今雖然遠在美國另一端的西岸，每隔一段時間都還回去看看。因想及個人的生命有時而盡，社團的生命却可以薪火相傳；所以我想設立一個佛學社，命名「思貽」，作為對齊老師永恆的紀念，也許是最有義意的事——成立「思貽佛學社」的個人情懷如是。

不可諱言，佛教在美國的力量還很薄弱。多年前我在印地安那大學齊老師門下修習佛學，個人聞見所及，那裏似乎沒有佛教團體，也不見佛教活動的跡象。反之，一位長老會的美國老牧師每個星期天都到學生宿舍來，專門勤請中國同學到他的教堂聽道；我在印大兩度發生住宿的問題，也都蒙基督教牧師協助解決。佛教原是中國人的宗教，至少是中國化的宗教；而洛杉磯郡的蒙特利市中國人聚居，有「小台北」之稱，佛教理當興盛。但在街頭

巷尾走一遭，看到的都是些基督教教堂和團體，幾於「五步一閣、十步一樓」的程度，實在令人驚嘆不置；反觀佛教寺廟團體却屈指可數。因此深信成立佛學社團是當務之急：不僅要在中國人中恢復中國人本有的宗教，更要把這宗教傳給美國人，要不然佛教徒留在美國作什麼？——成立「思貽佛學社」的客觀環境又如是。

現在「思貽佛學社」已委由會計師李居士坤育辦理立案，又有「慈樂境地」惠借社址。初步的構想是成立圖書室：我個人可以提供一些中文及英文的藏書；不過還賴向各界人士、佛教大德募集圖書、桌椅、書架、經費才能期其眾緣和合，稍具規模——人們可以專意來此閱讀、討論、打坐；也可以只把它當作人生旅途上勞碌奔波後的歇脚地，澄心靜慮，以便重整旗鼓；乃至有時等人而不來，要辦事而時候未到，或僅只感到寂寞無聊，都可以溜達來這裏，受點佛法的薰陶，談點人生問題，尋求書本作情智上的良伴，豈不有如在熱惱世間獲取一帖清涼劑，遠勝於作無益之事以遺有涯之生。

嚴肅一點說，在佛教受迫害的時代裏談「不立文字」，傳教可以以不著形跡，不失為避禍之道——自然「明心見性」的效果也在所多有；但其流弊則是空腹高心。重視讀經，雖或不能悟道，至少是讀了經打下了悟道的基礎。不論是倡導佛教或佛學，這都是最平穩，最腳踏實地的辦法；不似空言見性，不幸而不能見性，便虛耗時光，白過一生，何其危險，何其危險。因此人人都當痛念人身難得，一切眾生唯有人能讀經；暇時便置身書城，這才不負此身與此生。

莊子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和弟子間也有類似的對話。我們不這樣想。我們期望齊老師乘願再來，看到他和壽治老法師的理想之終得實現！

(完)